

茶村屋志：一栋土家族传统民居的变迁史

Tea Village Dwelling Chronicles: Historical Changes of a Tujia Traditional Dwelling

陈斯亮 | CHEN Siliang 李晓峰 | LI Xiaofeng 乔杰 | QIAO Jie

中图分类号: TU-09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2024)05-0062-09 DOI: 10.12285/jzs.20240118001

摘要: 屋志，记一屋之事，述一家之情。已有传统民居研究主要关注静态的建筑空间现状，“屋志”研究再现了传统民居个案从建造到使用的历时性变迁过程，旨在从时空维度构建一种“走向生活现场”的微观建筑史学转译方法。以一栋典型的土家族传统民居为例，在实地调研基础上，通过对屋主的访谈及其家庭日常生活的观察，梳理建筑空间的动态变迁过程，明晰空间变迁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以期探究当地传统民居变迁的适应性机制，进而为民族地区产业振兴背景下传统民居的存旧续新提供路径指引。

关键词: 屋志、传统民居、日常生活、土家族、微观史学

Abstract: "Dwelling Chronicles" is a memoir not only of architecture but also of its inhabitants. Existing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dwellings mainly focuses on the st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architectural space. The study of "Architecture Chronicles" aims to reproduce the diachronic process of change in traditional dwelling cases from construction to habitation. Its goal is to establish an architectural translation method, incorporating the spatiotemporal dimension of "visiting the scene of life". On the basis of field research of a typical Tujia traditional dwelling, we conduct interviews with the owner and observe his family's daily lif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evolutions of architectural space. Moreover, we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profound cultural motivation and explore the adaptive mechanism of local traditional dwellings, thereby providing guidance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traditional dwellings.

Keywords: Dwelling Chronicles, Traditional dwellings, Daily life, Tujia nationality, Microhistory

作者:

陈斯亮，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李晓峰（通讯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乔杰，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2008179)“武陵山区乡村小流域‘产业—空间’组织模型研究”。

录用日期: 2024-05

一、屋志：一种传统民居研究的微观史学方法

我国传统民居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研究视野已从建筑个案转向多元并举，并有追求“宏大叙事”的趋势，面对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发展要求，有必要适时地回归于建筑个案研究。20世纪30年代，刘敦桢、刘致平等一批早期建筑学者拉开了传统民居研究的序幕^{[1][2]}，主要关注传统民居的建筑形态和建造技术^[3]。时至今日，传统民居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壮观，研究对象从建筑

个案扩展至聚落及其所在民系和文化区^{[4]-[6]}，研究方法也从建筑学拓展为城乡规划学、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7]。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民居的相关物理数据获取愈发便利，新技术的应用有助于研究者在整体上发现传统民居的表特征及分布规律^{[8][9]}，但如果只局限于物理数据的分析，将难以明晰不同民居之间的社会空间差异^[10]。因此，传统民居研究应该重新聚焦于建筑个案，进而探寻其承载的活态居住文化，这一转向与“微观史学”主张在特定时空对具体个案进行深度观察的价值观^[11]相契合。

已有关于建筑个案的研究往往基于静态的物理空间现状展开,对传统民居从建造到使用的历时性研究亟待补充。在我国乡村,建房子一直是一个家庭实现代际传递、维系长期生存的头等大事^[12],为了建造一栋气派的房屋,不惜砸锅卖铁甚至高举债台^[13]。一般情况下,村民由于财力有限,在房屋主体框架建立后,装修一部分便先住进去,等经济条件好转了再装修剩余部分^[14]。这就意味着传统民居从建造到使用直至最终完善是一个动态变迁过程^[15],对该过程的历时性追踪是传统民居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居民是传统民居的使用主体,如果只研究“居”而忽略了“民”^[16],缺乏对居民日常生活的考量将不利于理解建筑空间的变迁过程^[17]。日本学者今和次郎提出了“考现学”概念,主张将居住空间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相结合^[18],以此揭示它们背后隐藏的文化特征^[19];美国学者格拉西在多学科的研究视野下观察传统民居,进而解释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和地域文化变迁^[20];黄华青通过对武夷山茶村中“厂宅”建筑的深入研究,提出“空间志”的研究方法,尝试在物质文化层面梳理建筑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21];王逸凡使用“建筑民族志”的图绘方法再现了“泉州铺镜”的场所空间以及本土生活方式^[22]。以上研究均借鉴了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和方法,深刻阐释了民居空间与日常生活的作用关系,但传统民居个案承载的生活史^[23]价值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可能性。

回顾和梳理相关研究历程后,本文基于传统民居个案的“空间——生活”互动机理,首次提出“屋志”的研究概念,旨在从时空维度构建一种“走向生活现场”的微观建筑史学转译方法。屋志,记一屋之事,述一家之情,即记述一栋传统民居从建造到使用至今建筑空间变迁,以及该过程中屋主一家日常生活变迁的文本(图1)。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同一区域不同民居类型进行共时性比较分析,进而从中选取典型民居个案,再通过对屋主的访谈及其家庭日常

生活的观察,梳理建筑空间的历时性变迁,明晰空间变迁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以期探究适应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居住空间更新机制。一直以来,传统民居作为“有生命的建筑”^[24],客观展现了地方社会变迁浪潮中的个人选择^[25]。本研究将以一栋新旧结合的土家族传统民居为例,尝试从屋主自发建造更新的空间变迁过程中,折射所在民族乡村社会的发展轨迹,并为传统民居整体的存旧续新提供理论指导^[26]。

二、茶村:当代土家聚落中民居类型的共时性比较

茶文化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土家族敬畏自然的人居活动选择。土家族主要分布于湘鄂渝黔交界的武

陵山区^[27],该地区山高雾多,为茶树扎根之宝地^[28],自古就是我国主要的茶产区之一^[29],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以盐、茶等为主要商品的贸易通道^[30],它们也为土家族与周边汉族、苗族等多元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便利条件。本文选择的研究地点为湖北省利川市毛坝镇兰田村^①,该村位于鄂西武陵山区重要茶叶品牌“宜红茶”的核心产区,人居环境变迁历史与茶产业发展密切相关^[31],同时又在星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32],承担着民族乡村振兴与地域生态保护的双重重任(图2)。

随着时代的发展,兰田村的民居类型由单一的吊脚楼转向多元,这为“屋志”研究样本的选择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性。历史上,兰田村广泛分布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木构吊脚楼,体现了土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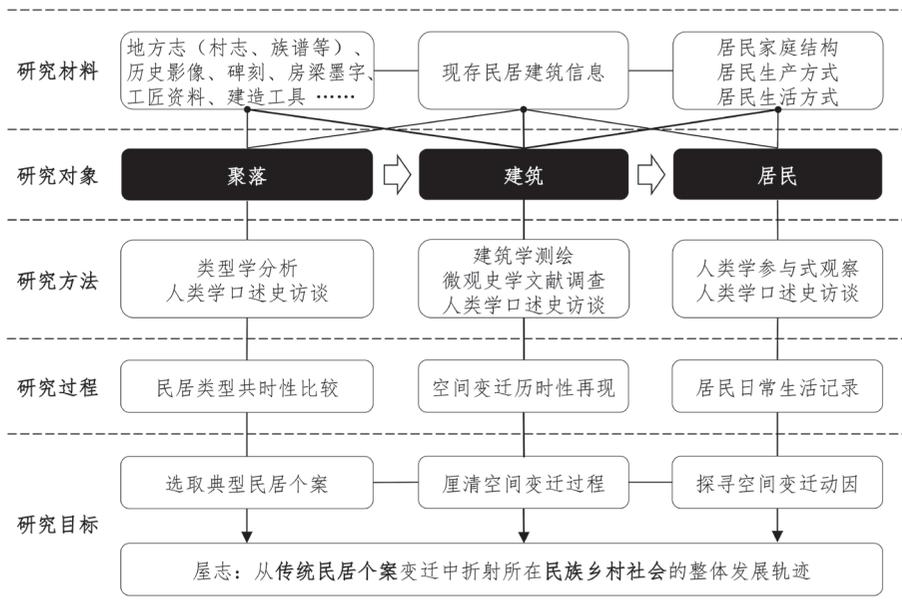


图1:“屋志”研究框架



图2: 兰田村“山—林—宅—茶”交错分布格局



图3: 兰田村多元共生式建筑风貌

族人的生存智慧；改革开放后，兰田村村民收入显著提高，传统的吊脚楼被大量改造、更新甚至是重建，民居类型趋于多元（图3），人居环境大幅提升的同时，也使得原本和谐的聚落生态遭受到了破坏^[33]。试以建筑材料和使用功能为标准，将兰田村现有324栋民居划分为传统木构型、新旧结合型、现代砖混型和现代木构型4类（图4）。其中，传统木构型126栋（占比38.9%），新旧结合

型38栋（占比11.7%），现代砖混型155栋（占比47.9%），现代木构型5栋（占比1.5%），它们均由村民自发选择并建造，共同构成了兰田村多元共生的当代建筑风貌（表1）。

1. 传统木构型

传统木构型是兰田村传统建筑风貌的留存主体，但在持续的乡村建设行动和村

民自主更新过程中被大量拆毁，存续情况不容乐观。该类民居均为穿斗式吊脚楼，并以双层的正屋三间带偏房为主要建筑形式。兰田村现存的传统木构型民居大都空置，它们的屋主举家迁至县城或乡镇生活，即使还在正常使用的，平时一般也只留家中老人居住。

2. 新旧结合型

新旧结合型，顾名思义，由传统木房和现代砖房两部分组成，造就了新旧反差的拼贴风貌。新旧结合型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思想观念差异，老年人习惯于住在传统木房中，感觉温暖亲切，而年轻人大都认为砖房“洋气”，住起来也更加舒适。由于一户一宅政策^②的限制，年轻一辈成家后若不分户，则只能拆毁属于自己部分的老房，并紧贴剩余部分老房另建新房。

3. 现代砖混型

现代砖混型是现阶段兰田村数量最多的民居类型，它们既提升居住水平，也使聚落整体风貌变得混杂^[34]。传统木构型被现代砖混型大量替代，说明了村民家庭经济条件改善，更反映了村民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传统木房”意味着贫困、落后，“现代砖房”代表着财富、发展。因此，当少数村民在外打工赚钱后回村拆旧房建新房，这股风气便如“流感”般在全村传导与蔓延^[35]。

4. 现代木构型

现代木构型是由传统工匠建造并在形式、功能等方面有一定创新的民居类型，它延续了传统建筑风貌，又兼顾了居住舒适性。近几年，随着木料价格的回落，现代木构型开始在兰田村出现，虽然数量还不多，但该类建筑对传统民居的有序传承意义重大，代表了年轻一辈村民思想观念的再次转变与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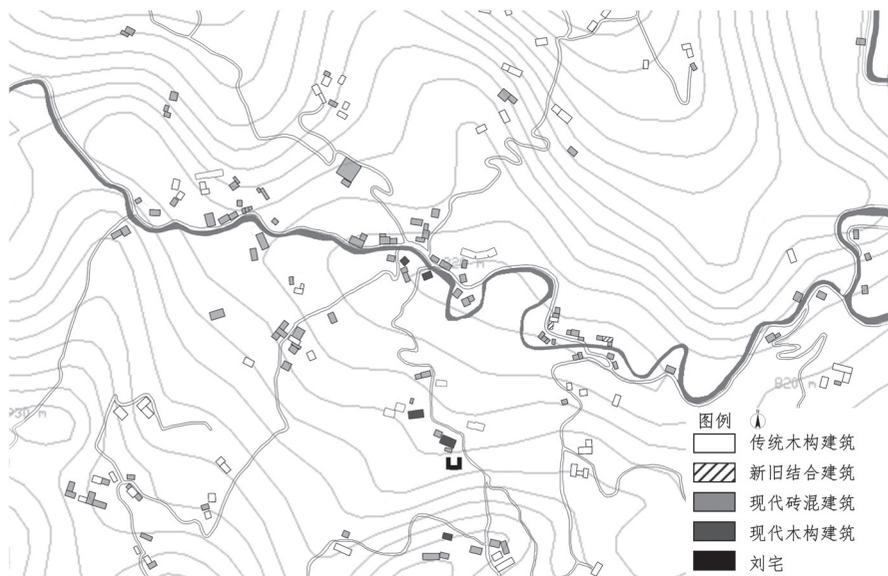


图4：兰田村中心村湾民居类型划分

兰田村各类型民居典型案例

表1

 <p>传统木构型</p>	 <p>新旧结合型</p>
 <p>现代砖混型</p>	 <p>现代木构型</p>

砍伐树木的数量有限。1985年，屋主父亲开始进山伐木，直至1990年才为新房备料完毕。

2) 正屋完善期

受经济条件制约，刘宅的正屋从建造到使用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完善过程（表2），该过程也普遍存在于土家族传统民居的生命周期中。1990年，作为掌墨师^⑧的屋主爷爷带领工匠团队加工木料后，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立屋上梁，合力完成了新房正屋大木构架的建造。1991年，屋主一家搬入新房，同时将祖宅中属于自家的部分拆除，老木料变卖，老瓦重新铺设于新房屋面。新房的一楼退堂和二楼东边小二间后部封板使用，其余部分均开敞。1993年，正屋一楼左边小二间后部封板作为火塘间，火塘改为火炉，退堂只作为厨房使用。1998年，正屋二楼左边小二间前部封板作为父母卧室，原房间则改为屋主哥哥卧室。2001年，正屋一楼左边小二间前部封板作为火塘间，后部改作储藏间。2003年，正屋整体封板完毕，并浇筑水泥地面。至此，刘宅的正屋全部投入使用。

3) 加建拓展期

由于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加，屋主开始在正屋基础上进行加建拓展。2005年，屋主结婚，大女儿出生，兄弟正式分家，同样以堂屋中线为界，正屋东边归哥哥，西边归屋主。屋主在正屋西边加建砖混结构的单层偏房，前部作为火塘间兼厨房，后部作为母亲卧室，这既降低了木结构正屋的消防安全隐患，也减轻了年迈母亲上下楼层的不便。2006年，屋主两兄弟随全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大流，举家前往浙江从事建筑行业，一直到2015年回村之前，刘宅都处于空置状态。

家庭产业转型加速了刘宅的加建拓展。2015年，二女儿出生，大女儿也即将就读初中，为了更好地照顾她们，屋主一家回村生活。同年，兰田村入选“利川市乡村旅游民宿示范村”，借着全村大力发展民宿业的东风，屋主在原有单层偏房基础上加建一层，将它装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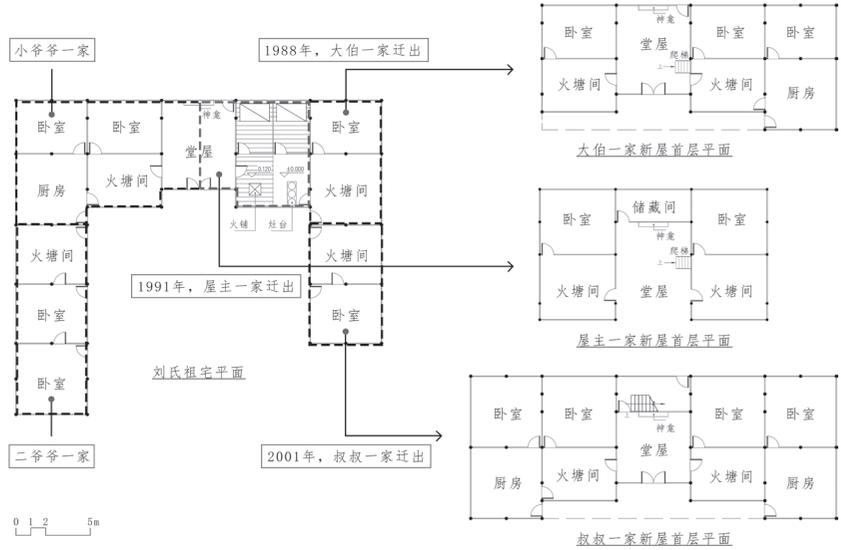


图8. 刘氏祖宅变迁示意

刘宅“正屋完善期”的平面变迁

表2

	一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1991年		
1993年		
1998年		
2001年		
2003年		

布置为两间带独立卫生间的民宿标间。2016年,屋主将正屋重新装修,并与哥哥同步在正屋两边加建砖混结构厢房,围合形成一正两厢式“撮箕口”吊脚楼,东边厢房暂时空置,西边厢房作为民宿,正屋退堂改为楼梯间。该建筑形态一直延续至今(图9)。

3. 建筑变迁趋势分析

通过对刘宅空间变迁过程的梳理,并将该过程中不同时间节点对应的建筑要素并置对比,可以发现如下趋势:

1) 建筑材料多样化。传统民居变迁首先表现在新型建筑材料的引入^[36]。除了瓦面,刘宅早期使用的建筑材料只有木材,直至正屋西边偏房的加建,混凝土、空心砌块砖等现代建筑材料开始出现。2003年,星斗山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再允许办理“砍伐证”,木材获取越发困难,这是导致刘宅的建筑材料多样化的主要原因。屋主对此无奈感慨道:“木头买不起,成本太高,我自己山上有也砍不了”。

2) 建筑平面祖宅化。兰田村的传统民居中带有厢房的极少,但刘宅的建筑平面在经历正屋完善和加建拓展后,发展成为与祖宅形制相同的一正两厢式。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屋主的有意为之,“主要是因为念旧,差不多的房屋布局,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在祖宅中与家人一起生活的过往”。

3) 建筑功能复杂化。在刘宅变迁过程中,餐厅、卫生间等新功能空间置入的同时,原有功能空间也在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火塘间重要性增加和堂屋重要性降低(表3)。火塘间变动较大,但一直是刘宅使用频率最高的空间。位置上,先后存在于退堂、一楼东边小二间后部、一楼东边小二间前部、一楼西边小二间前部和西厢房转角^⑩;形式上,从地火坑变为火炉;功能上,从最初的烤火取暖变为集烤火、吃饭、休闲、娱乐和学习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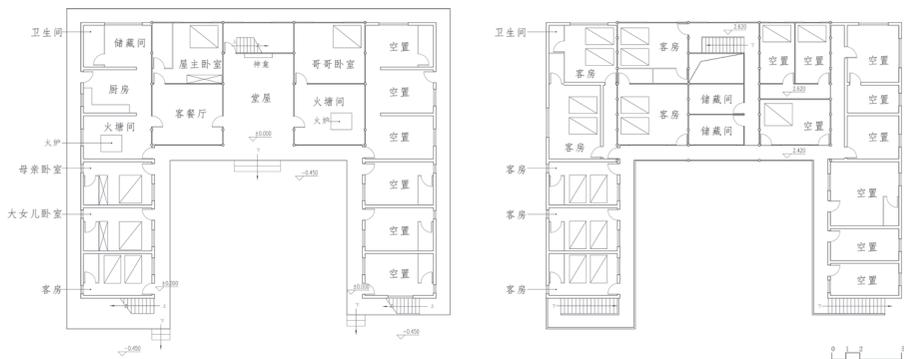


图9: 刘宅现状平面布局(左:一层平面,右:二层平面)

刘宅堂屋/火塘间使用前后的生活场景对比示意^⑩

表3

堂屋	火塘间
<p>1991年堂屋生活场景再现</p>	<p>1991年火塘间生活场景再现</p>
<p>2024年堂屋生活场景现状</p>	<p>2024年火塘间生活场景现状</p>

堂屋是刘宅早期最重要的仪式和生产空间,但生产方式的转变让它沦为了过道和临时储物空间。随着屋主自家田地的主要作物从低端茶叶升级为高端茶叶,堂屋的生产功能逐步丧失。种低端茶叶时,一家人的农活为茶叶种植、机械采摘和一系列粗加工工序,其中,茶叶在正屋的二楼西边小二间和阁楼进行萎凋,在堂屋进行揉捻、发酵和晒干;改种高端茶叶后,农活变为茶叶种植和手工采摘,采摘后的鲜叶由茶厂当天统一组织收购,无需再进行茶叶粗加工。

四、茶村屋志:日常生活对传统民居变迁的理论观照

传统民居研究应注重对空间组织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探讨^[37]。“日常生活”包含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38], 生活方式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生产^[39]。通过对屋主一家日常生活的参与式观察,尝试从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面揭示隐藏在刘宅空间变迁背后的深层动因(图10),并将其概括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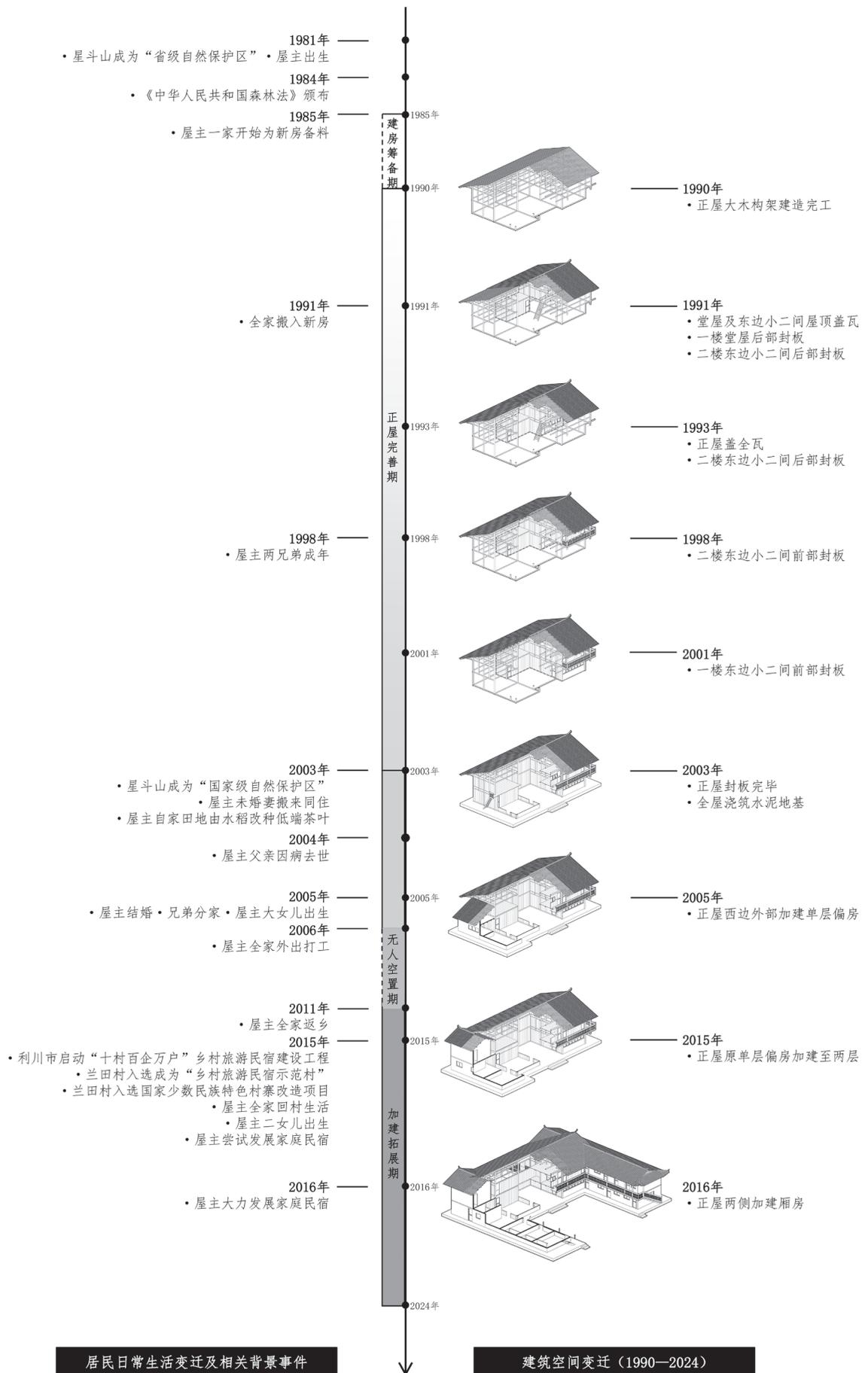


图 10: 居民日常生活—建筑空间变迁时间轴

1. 家庭结构变迁是建筑空间扩张的根本动因

刘宅的数次空间扩张都源于屋主的家庭结构变迁。屋主父母结婚后，在祖宅中分得房屋一间半，屋主兄弟的出生使得居住空间不足，屋主父亲开始筹备另建新房，并于1991年迁入刘宅；2005年，屋主结婚，大女儿出生，屋主一家分得正屋西边小二间，同时在旁边加建偏房作为辅助用房使用；2015年，小女儿出生，为获得更大的居住空间，屋主将原有偏房扩大并加建至二层。“不够住，地方太窄了”是屋主在谈及房屋变迁原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正是家庭人口增加直接导致了房屋的“不够住”。

2. 产业转型发展是人居环境改善的基础动力

屋主一家的主要生产方式转型提高了收入水平，并不断推动着刘宅变迁。1991—2002年，屋主一家以水稻种植的第一产业为主，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在此期间刘宅正屋缓慢完善；2003—2005年，屋主一家的农田由水稻改种低端茶叶，并有少量茶叶粗加工的第二产业，收入水平初步提高，刘宅正屋得以全部封板使用；2006—2014年，屋主一家先后在浙江和毛坝镇上务工，收入水平显著提高。2012年，屋主委托亲戚帮忙将自家茶田改种高端茶叶品种“冷后浑”，至2015年屋主一家回村生活，茶田的产出成为屋主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2016年至今，屋主一家大力发展以民宿为主的第三产业，翻修正屋的同时，加建了两侧厢房，这也极大改善了刘宅的建文人居住环境。

3. 民族文化认同是建筑风貌协同的内生规制

屋主兄弟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保障了刘宅旧有正屋和新建厢房的建筑风貌协同。刘宅初建时期，土家族地区未受到过

多现代文明的冲击，乡土社会存续状况良好，传统民居呈均质化特征；刘宅空置时期，土家族青壮年在打工大潮影响下纷纷前往东南沿海谋生，大部分传统民居的变迁被人为按下了暂停键；刘宅加建时期，数次乡村建设行动让土家族地区的民居形式趋于个性化，但刘宅没有被简单地推倒重建，而是仿照正屋的传统样式，加建了两头的厢房，“老屋是父亲留下来的，同时也代表了土家族文化，我不想把它毁掉”，正是屋主的民族文化认同，造就了现在这栋风貌协同的新旧结合式民居。在此期间，虽然屋主哥哥一直生活在利川市，但在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支撑下，也委托屋主同步加建自己这头的厢房，为年老返乡预留了退路^[40]。

上文从聚落、建筑和居民等不同层面厘清了刘宅的变迁史。基于“屋志”的研究方法，将刘宅的空间变迁划分为两部分，前期遵循集体意志，正屋完善缓慢而有序，后期体现个人选择，厢房与正屋的建筑形态相协调，该过程是兰田村乃至整个土家族地区传统民居适应性变迁的一个缩影。再结合对屋主一家日常生活的观察，揭示了家庭人口增加、产业转型发展和民族文化认同是刘宅空间变迁的深层动因。而受条件所限，该个案研究尚存不足，例如，未能追溯刘宅初期的正屋建造过程，作为推导建筑变迁过程的研究材料也略显单一。

五、结论与讨论

“屋志”研究尝试从微观史学视角关注生动鲜活的传统民居个案，借此打破在“国家”与“地方”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精英”话语体系^[41]。具体而言，“屋志”研究的意义在于：1) 实现传统民居物理数据和日常生活的时空记录与整合，包括建筑技术图纸、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工匠营造技艺等；2) 进一步认知并挖掘传统民居个案承载的乡村文化遗产价值；3) 通过多样化的典型民居个案积累，重新理解并诠释地方生活史进而洞悉民族乡村社会

变迁，并为传统民居的存旧续新提供路径指引。

“屋志”研究探讨了传统民居变迁的适应性机制，找寻了根植于居民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并为理解地方生活史提供方法论支持，为重塑富有“乡愁”的人居环境提供理论指导，为记录当代乡村发展历程提供微观史学材料补充。以鄂西茶村刘宅为代表的地方性民居，正是在不同的个人选择下，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类型特征，这是一种客观现象，无意褒贬。但是，在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建设行动背景下，应尊重和鼓励村民基于地方生活实践的民居存续更新选择，并结合村民日常生活、区域产业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多维需求，科学引领村民自发改造一批如刘宅一般既置入现代居住功能又延续传统建筑风貌的民居，联动政府、市场、村民、工匠等多方乡村建设主体，合力推进传统民居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民族地区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

值得注意的是，“屋志”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传统民居不同于官式建筑，相关研究材料如文字记载、历史影像等大都较为匮乏，过往的空间组织形式和日常生活方式一般只能通过居民的访谈获取，虽然居民都是建筑变迁的亲历者，但记忆难免会有偏差，而且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也存在预断和引导的可能，所得访谈材料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因此必须反复求证，尽量辨别材料的真伪。

注释

- ① 本文的“兰田村”特指2022年合村并组之前的兰田村，不包含新近并入的杉木村和老木村。
-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 ③ 土家族人将正屋一侧出挑厢房的建筑形式称为“钥匙头”，正屋两侧出挑厢房的建筑形式称为“撮箕口”，一般正屋落地，厢房吊脚。
- ④ 当地将落地柱称为“柱”，不落地柱称为“骑”。
- ⑤ 房屋方位上，当地以人在屋内面朝大门时的前后

左右为基准,左为东,右为西,东边地位高于西边。

⑥ 土家族人将堂屋前部略向室内退进的做法称为“吞口”。

⑦ 为尊重屋主及其家人的隐私,本文以屋主对他们的称谓代替原有姓名。

⑧ 土家族传统民居工匠团队中掌握核心营造技艺的角色被称为“掌墨师”。

⑨ 1991年刘宅堂屋和火塘间的生活场景主要根据屋主口述再现而成。

⑩ 土家族人将正屋与厢房相交部分的空间称为“转角”。

参考文献

- [1] 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M].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1956.
- [2] 刘致平.中国居住建筑简史[M].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 [3] 肖旻.话语山水间:华南民居研究笔记[J].建筑学报,2014(21):123-127.
- [4] 陆元鼎.中国民居研究五十年[J].建筑学报,2007(11):66-69.
- [5] 李建华,张兴国.从民居到聚落:中国地域建筑文化研究新走向——以西南地区为例[J].建筑学报,2010(03):82-84.
- [6] 常青.我国风土建筑的谱系构成及传承前景概观——基于体系化的标本保存与整体再生目标[J].建筑学报,2016(10):1-9.
- [7] 李晓峰.乡土建筑: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 [8] 李哲,孙肃,周成传奇,等.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通过三维计算挖掘和量化传统村落智慧[J].建筑学报,2019(02):74-80.
- [9] 卓晓岚,肖大威.基于全域调查的赣闽粤客家传统民居类型发展规律及地理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建筑学报,2020(52):16-22.
- [10] 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J].史学理论研究,2002(01):21-29+161.
- [11] 邓京力.微观史学的理论视野[J].天津社会科学,2016(01):153-160.
- [12] 鲁西奇.长江中游的人地关系与地域社会[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 [13] 祝仲坤.农民工返乡建房行为研究——基于推拉理论的解释框架[J].经济体制改革,2017(03):89-94.
- [14] 柳肃.湘西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15] 陈志华,李秋香.中国乡土建筑初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 [16] 李东,许铁铨.空间、制度、文化与历史叙述——新人文视野下传统聚落与民居建筑研究[J].建筑师,2005(03):8-17.
- [17] 龚恺.村·族·家——徽州村落与生活空间的演化[J].建筑遗产,2021(01):1-14.
- [18] 胡惠琴.住居学的研究视角——日本住居学先驱性研究成果和方法解析[J].建筑学报,2008(04):5-9.
- [19] 郭屹民.考现的发现:再现日常的线索[J].建筑师,2014(05):6-20.
- [20] Glassie, H. Folk Housing in Middle Virginia: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Historic Artifacts[M].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5.
- [21] 黄华青.武夷山桐木村当代茶村厂宅的空间与社会变迁[D].北京:清华大学,2017.
- [22] 王逸凡,张杰,李滢君,马筱蕾,崔文泰.泉州铺境及其“场所精神”:一种建筑民族志的视角[J].建筑学报,2022(03):97-103.
- [23] 胡悦晗,谢永栋.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J].史林,2010(05):174-182+191.
- [24] (荷)亚历山大·楚尼斯,利亚纳·勒费夫尔.批判性地域主义——全球化世界中的建筑及其特性[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25] 黄华青.空间作为能动者:基于“空间志”的当代乡村变迁观察[J].建筑学报,2020(07):14-19.
- [26] 张维.小改动中的格局变迁——传统江南民居空间演变中的适应策略研究[J].建筑遗产,2017(02):100-111.
- [27] 郝时远.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
- [28] (唐)陆羽.茶经[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29] 黄柏权,平英志.以茶为媒:“万里茶道”的形成、特征与价值[J].武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06):69-80+167.
- [30] 赵速,杨雪松,张钰.“川盐古道”文化线路之研究初探[J].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 No.122(02):314-317.
- [31] 李杏.产业变迁视角下鄂西南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22.
- [32] 利川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利川市志:1986-2003[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 [33] 林晓丹.黄河晋陕沿岸“上首厅房”宅形解读——基于拉普卜特《宅形与文化》理论视角的在地思考[J].建筑师,2023(06):101-107.
- [34] 肖文彦,李晓峰,李振宇.土家族传统民居功能演变与形式转向——以鄂西利川市兰田村为例[J].华中建筑,2023,41(01):135-141.
- [35] 杨慧慧,李婉妍.乡村社会生活逻辑与价值:基于一个侗族传统村落民居变迁的观察[J].广西民族研究,2019(06):58-64.
- [36] 单军,周婷,杨柳青.湘西永顺土家族传统民居变迁调研及分析[J].住区,2014(02):139-154.
- [37] 余英.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类型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 [38] 杨建华.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J].浙江学刊,2002(04):75-80.
- [39] 汪原.亨利·列斐伏尔研究[J].建筑师,2005(05):42-50.
- [40] 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3):19-26+152.
- [41] 乔杰,李晓峰,洪亮平.国家叙事与地方表达——论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建设中的文化主体性价值[J].新建筑,2024(03):108-113.

图表来源

表3: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民族建筑研究中心其余图表均为作者拍摄、绘制